



哲学基本原典导读丛书

张周志 主编

现当代西方哲学原典导读

张周志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西北政法大学哲学
国家级特色专业
省级重点学科
省级特色学科
资助成果

现当代西方哲学原典导读

张周志 编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当代西方哲学原典导读 / 张周志编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17-2777-0

I. ①现… II. ①张… III. ①西方哲学-现代哲学-
著作-介绍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7163 号

现当代西方哲学原典导读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 巍

责任编辑: 冯 章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5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13 千字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5.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55626985

《哲学基本原典导读丛书》序言： 深入原典文本 诠释思想本意

长期以来，哲学的大众化和普及化，固然呈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超越了其阳春白雪的庙堂文化的贵族性，使哲学回归每个个体生命此在的生活世界，呈现出生机和活力。但几乎与此同时，哲学原本的形上精神和崇高使命也逐步被消解。特别是哲学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极端应用，使得人们更加远离了哲学的精神家园。尤其是现代人类趾高气扬地对待前人的思想文化，一味庸俗化地应用哲学的批判理性精神，简单化批评历史上的哲学家及其思想理论，教条化地给一切哲学家划派别、扣帽子（甚至打棍子）。惟其如此，博大而精深的哲学思想史，就被整体划一地变成了硬邦邦的“两大阵营、两个派别对立斗争的历史”。这样以来，不仅活生生的哲学思想的历史被消解了，而且哲学理论的逻辑也被遮蔽了。留下的仅仅是一些孤零零的命题，而且，多半是被当成批判和嘲笑的对象。

这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加上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价值理念，人为造成了思想不能承载之轻——时下所谓学会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用之能包医百病，似乎是比较高级的学习哲学的境界。可笑的是，这种思维的懒惰在面对现实的困惑时，竟然反过头来还抱怨“哲学的贫困”。

只要我们超越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冷静理性地深入历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的原典文本，深入解读其思想真谛，寻觅其思维的逻辑，将会恍然大悟，原来贫困的不是哲学本身，而是我们理解和应用哲学的方式和态度。惟其如此，哲学基本原典的文本解读和意义诠释，对于当下的时代而言，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

一、祛媚超俗以彰显哲学思维的形上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并不在于其趋炎附势、一味地谄媚现实，恰恰在于其以智慧的方式批判现实，从而呈现其超越性的思想价值。由此决定了越是重视工具理性的时代，哲学思想的价值理性的意义就越重要。当下全球化的时代就是如此。

当今世界，又是一个工具理性高于一切的时代，一切皆被世俗化的商品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所蚕食，人的思想智慧、人格尊严和道德精神等，均在强大的消费主义文化理念面前自惭形秽。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使人的目的性进一步强化。微电子科学和通讯技术加强了人们即时性的密切交往，光的极限速度的交往工具，极大地缩短了人际间的时空距离，全球人类共处一个村庄；宇航技术使人类活动空间和认知的视域无限广袤，从而具有了宇宙性的视野；克隆技术、临境技术和纳米技术使得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物质，都可以被制造、复制和再现……现代科技的工具理性价值，使人类几乎无所不能、随心所欲彰显自我的目的，从而趾高气扬地追求和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成果。

然而，这种唯工具理性的思维，使人类在物质主义、感性快乐主义的现代世俗消费文化观念引领下，在一味地追求外在感觉的刺激享受的同时，迅速消解着传统思维和文化的形上崇高性。不仅内在心性的道德崇高感成为奢侈而变得虚渺，而且在神、自然和一切他者面前，人类早先尚有的一点谦恭敬畏意识的美德也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无知的自大和狂妄，是被曲解和极端化利用了的启蒙理性的所谓主体意识。这种在上帝隐退后的感性唯我论的新话语霸权，目空一切地不断狂妄宣称：不仅“上帝死了”，而且“人死了”、“思想者死了”。因而一切不能回归到感性生活体验的所谓思想文化都被宣布为无意义。所以，要求人有敬畏意识，使人向善的“宗教终结了”；使人以智慧的思想形式不断超越的“哲学终结了”；以探索真理为己任的“科学终结了”；强调思想与利益密切相关的“意识

形态终结了”；使人在崇高中追求愉悦的高雅“艺术终结了”；人类在丰富多样的理性规则下不断进步的“历史也终结了”。在这种所谓现代文化的世俗主义视域中，剩下的惟有肉身的物欲快感。至此，文化的人化方向只剩下物质化、肉体化、感性化的单向度引导。文化的化人作用也仅仅向感性快乐方向的形下堕落。这种突出目的、重视手段的所谓价值论思维，必然造成学术凸显而思想淡出、价值至上而真理隐退、主观目的性膨胀而客观原则性消解、权利意识强化而义务责任解除等文化异化现象。

毋庸置疑，虽然这种价值至上论的世俗化的工具理性思维，诉诸于利用和激发人的自然生理需要和感性快乐体验追求的本能，从而促进了现代器用文明的繁荣，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把高雅超越性的道体文化推向堕落的罪过。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实用价值至上论的世俗文化思维，造成了文明与文化的离心离德。它使现代文化的外在刺激振聋发聩，而主体的内在体验则麻木不仁。因而使文化和思想失去了反复咀嚼，回味无穷的心理震撼性。在这种世俗化的文化理念引导下，

无论是各种文化文本的创作还是文化受众的消费，都充分表现出不求深刻和久远，只求快乐和一时的所谓现实主义。作者是随便玩玩，受众照样不过是随便看看、听听、笑笑而已，压根无须思虑，更谈不上内省和反思。加之现代传媒诉诸于技术理性的多维冲击，使你连感官的感受也失去了反映的时空和机会，只是跟着机器的机械和电子运动而疯癫，根本没有个性体验和内在超越的诉求。

同时，这种世俗化的物质主义文化，使人这一理性的存在的理论理性的思的主体意识逐步隐退，而实践理性的行的自主性日益彰显；人文道德理性严重缺失，工具理性不断膨胀。这种试图超越客观真理，突出主观目的的价值至上论思维，不可避免地造成真理和事实被消解，一切都变得无所谓的文化虚无主义。按照这种思维的逻辑，任何东西都沦为世俗的感性生活的奴婢，都可以被嬉戏调侃。因而，在知识论领域，认识的反映论和真理的符合论分别被主体的目的论交互主体的协商论所代替，所以，如何说都行的相对论必然盛行。既然政治无理性，自然可以被肆无忌惮地调侃；既然社会和伦理规则不是客观的，而是交互主体的商谈和共识，那么攻守

同盟和党见的相互调侃就司空见惯；既然科学追求真理和发现客观规律的使命已寿终正寝，那么专家之间，以及社会大众对于专家的调侃就见怪不怪……这种调侃一切、玩世不恭的文化现象，本质上皆缘于错误地理解并极端地发挥了启蒙运动以来人本主义的思想，使其迅速滑向人类主观目的性膨胀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价值至上的实用主义。

这种以人为目的本身的主体性思维的出发点，试图超越主客两分的思想方法，从而以主体的主观意向性统摄和驾驭客体世界及其规律，从而使真理屈从于价值，正义委身于强权，知识服务于利益。故此谄媚之风自然盛行，趋炎附势成为社会常态，巧言令色被谓之曰“有修养”或“成熟”。无视客观实在，仅从是否有利的价值原则出发捏造事实，为达到一己之私人为地制造事件，为实现小团体利益而掩盖事实真相从而扰乱视听，或别有用心之徒以讹传讹的煽情鼓动等等，枚不胜举的社会现实，特别是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的个性传统的诸多成因中，价值至上论的主体思维传统是绝对不能脱离干系的。价值的有用凌驾于真理的事实之上，道德的“应该”遮蔽了实存的“是”，艺术的审美价值掩盖了科学的事实判断等等，都是人的利益需要和满足的价值至上论思维的结果。

在这个人类什么都不缺，惟缺大智慧的仁人君子人格的现时代，回归哲学原典的解读，恢复哲学不断追问意义和追求真理的本真使命，不仅可以祛媚，超越人类与生俱来的功利世故和肤浅，而且可以彰显哲学爱智慧的真正形上价值。

二、还原思想本意以回归哲学的爱智本位

其实，把哲学理解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现代性的工具理性思维的结果。岂不知哲学的原本旨趣和学科本位并非如此。只有通过原典解读和哲学思想史的融会贯通，才能真正觉悟哲学爱智慧之本性。

希腊智慧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在批判继承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对于古希腊广义的哲学——智慧之学，对于狭义哲学——形而上学，进行了系统、全面反思与总结。其广义的哲学为西方科学文化奠定了基础，其狭义的哲学奠定了西方思想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原则，从而明确了哲学的

任务、性质和意义。他指出：“因为我们正在寻求这门知识，我们必须研究‘智慧’〈索非亚〉是那一类原因与原理的知识。如果注意到我们对于‘哲人’的诠释，这便可有较明白的答案。我们先假定：哲人知道一切可知的事物，虽于每一事物的细节未必全知道；谁能懂得众人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感觉既人人所同有而易得，这就不算智慧）；又，谁能更擅于并更真切地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被施为，他不应听从他人，智慧较少的人应该听从他。

这些就是我们关于智慧与哲人的诠释。这样，博学的特征必须属之具备最高级普遍知识的人；因为如有一物不明，就不能说是普遍。而最普遍的就是人类所最难知的；因为它们离感觉最远。最精确的学术是那些特重基本原理的学术；而所包涵原理愈少的学术又比那些包涵更多辅加原理的学术为更精确，例如算术与几何〈度量〉。研究原因的学术较之不问原因的学术更为有益；只有那些能识万物原因的人能教诲我们。知识与理解的追索，在最可知事物中，所可获得的也必最多（凡为求知而求知的人，自然选取最真实的也就是最可知的知识）；原理与原因是最可知的；明白了原理与原因，其它一切由此可得明白，若其次级学术，这就不会搞明白的。凡能得知每一事物所必至的终极者，这些学术必然优于那些次级学术；这终极目的，个别而论就是一事物的‘本善’，一般而论就是全宇宙的‘至善’。上述各项均当归于同一学术；这必是一门研究原理与原因的学术；所谓‘善’亦即‘终极’，本为诸因之一。”^①

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尽管人与高级动物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具有感觉与记忆，但二者不同之处，动物仅凭借现象与记忆活着，人则能把感觉与记忆内化为经验并凭借技术与理智而生活。因而人求知的过程是：感觉→记忆→经验→判断→技术→知识。经验较之于技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卷一·章二》。参考《形而上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术知识，前者为个别事物的认识，不能教给人；后者则是事物普遍的原因，能教给人，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所以真正的智慧“就是关于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而哲学就是对于这种智慧的追求。

哲学所爱的是大智慧，而非小技巧。出于伊雄语的古希腊“智慧”一词，其原本意义有三：一是一般的聪明与谨慎，二是敏于技艺，三是学问与智慧。惟其如此，人们后来就在学术方面分别了小巧与大智，并以此说明哲学爱大智的旨趣。最初以智人尊称毕达哥拉斯。后来智者学派的人滥用诡辩的机巧小慧，为人所鄙夷，便用“爱智者”——哲学家区别于“智者”——诡辩家，以哲学与诡辩术相区分。

哲学作为探求“普遍原理与原因”的大智慧，要求哲学家必须是博学之人，探求并教授给人们事物的“普遍原理与原因”。由此决定了哲学这门学术优于那些次级的学术，它比其他学术从事物中获得最多的东西，它不仅追求一事物的终极本善，而且追问全宇宙的终极至善。这门学术是为了求知而求知的“唯一的自由学术”，也是一门“神圣”的学术——因为神原被认作万物的原因与世间的第一原理，此学术或是神所独有、或是神能超乎人类所知独多。所以，哲学是于神最适合的一门学术，是一门神圣、纯粹的学术。

人们的哲学探索始于“对于自然万物的惊异”。在惊异与迷惑中，为了摆脱愚蠢无知，人们便开始了解释与探讨的尝试，最初的哲学探讨者就是“爱神话的人”，即“爱智慧的人”。所以，哲学并非追求一时一地的使用价值，而在于追问终极性的形上意义。所以，20世纪西方哲学大师罗素就说：“提出普遍性问题就是哲学和科学的开始”^①，这需要人们具有对于世界整体性把握的敬意之心，即黑格尔所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为无所不包的存在，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②

① [英] 罗素：《西方的智慧》（上），崔权禧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②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93页。

这种智慧的和智慧和智慧和终极的意义，不是轻易能够被觉悟到的，往往需要具有崇高的境界和持之以恒的精神，甚至付出毕生的心神。古希腊最大的智者——苏格拉底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目的，即使临死，毅然义正辞严：“只要一息尚存，我就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要继续教导、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不管你们是不是释放我，我是绝不会改变我的行径的，虽万死而不变”。正因为苏格拉底爱智慧的精神，他活着的时候堪称希腊人民的伟大导师，死后，也成为人类哲学思想的活水源头。他教导人“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心灵”，“金钱并不能带来美德”，美德却不仅能带来金钱，还能带来其他一切的好事。

苏格拉底以形象的比喻，道出了哲学家的职能。他认为自己是神赐给希腊的一只牛虻，为了使它这匹硕大的、迂缓不灵的马，在自己的叮咬下精神焕发。“牛虻”之喻，应该同柏拉图的“洞穴”之喻一样有名。它形象地道出了哲学及哲学家的功能。哲学家就是社会与时代的牛虻，通常他不是保姆与律师。他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批判角色，从而促进人类精神的向善与社会整体的进步。它也成为西方哲学的重要传统。对此可以在西方哲学史上，列出一长串哲学家的名字及其哲学著作的名字。而许多哲学家也常不为自己的时代所容，遭受着类似于苏格拉底的命运。

苏格拉底之死给人留下深刻的启示——思想之苦和智慧之艰与爱智者之崇高。惟其如此，西方历史上，人们通常将苏格拉底与耶稣基督相提并论。然而，耶稣是一个宗教传说中的神秘、神圣的人物。他以自己的生命去替人类赎罪。苏格拉底则是一个确实的历史人物，为了完成神赋予自己的哲学使命——教导人向善、关心自己的心灵、爱真理，却被自由的希腊与自己的同胞判处死刑。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遵守了一个公民义务应该遵守的法律，更维护了正义、自己的哲学信念、道德价值——这些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也反证了时代对于自己审判的不公正。他以自己的哲学实践、以自己的生命，证实了哲学的“神圣”“崇高”，也证实了批判性哲学家由于超越其时代“吃力不讨好”的悲剧性命运。苏格拉底最后的话：“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

福，只有神才知道。”^① 其实，并不需要神，历史已证明了苏格拉底这一爱智者的伟大。

三、返求自识以澄明思维意识的确然性

曾几何时，哲学这一关于智慧自身的学问，不仅自不量力，而且越俎代庖地要成为科学之科学，试图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但其不知如此以来，不仅因蚕食科学的领地而造成哲学与科学的分道扬镳^②，而且这种不务正业同时使得自身本真的任务——“思”被搁置。只有到了近代，这样一位一向被我们简单化批判的伟大哲学家——笛卡尔，才是哲学回归自我意识的精神家园。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视作哲学的第一原理，提出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追求“我思”的确然性，得出的无可怀疑的加以接受的知识与原理。明确主张，哲学就是面向“思”的事情。对此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不止一次的大加赞扬：近代哲学思维的真正认识论转向，直接肇始于笛卡尔的主体自识哲学，他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在主体理性自识的层次上，把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中世纪费其诺（M. Ficino，1433—1499 年）的“认识你自己”、中国古代老子的“识人者智，自识者明”、明代王阳明的“致良知”等的主体自识，升华到理性自觉的层面，并赋予其首要地位的意义，首开西方哲学主—客体分离和对立的认识论思维路径的先河。黑格尔认为，笛卡尔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的真正的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高度赞赏笛卡尔这个人，对他的时代以及对近代的影响，我们绝不能以为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是一个彻底从头做起、带头重建哲学的基础的英雄人物，哲学在奔波了一千年之后，现在才回到这个基础上面。^③

① 以上引自苏格拉底《申辩篇》。

② 甚至造成科学与哲学的大分裂，黑格尔哲学就是典型的例证。——本文作者注

③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67 页。

笛卡尔明确了哲学的任务就是澄明“我思”的确然性。“这条真理是这样确实，这样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他从普遍的抽象原则出发，将“我”作为一个纯粹的精神实体，是不依赖于物质性身体的具有自由意志的不死的心灵。然后他进一步由心灵实体推论，怀疑的我是不完满的，但是我心中分明有一个无限完满的观念，它必然是存在的。这就是上帝。不完满的我显然不可能有一个完满的观念——上帝，因此只能是这一完满的存在将此观念放入我的心中。上帝具有我所能想到的一切完满性。凡在心灵中呈现的东西都是真的。既然一切天赋的观念都是上帝赋予的，而完满的上帝是不会欺骗我们的，那么现在我心中清楚明白的拥有“物质”的观念，因此它也是真实的存在。这样，笛卡尔经过一番演绎便确立了从理性原则出发的三个实体观念：心灵、上帝、物质。上帝是绝对观念实体，而心灵与物质只是完满上帝赋予的相对实体观念。心灵实体，其根本属性是思想，是能动的、不占空间的、没有广延的；物质实体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它占有空间的、被动的、不能思想的。即是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精神辩证法。

那么，究竟如何达到形而上学的可靠道路呢？近代主体性思维之路的集大成者——康德提出：哲学需要“模仿”数学和经验的自然科学的理路。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不是“知识与对象一致，而是对象与知识一致”——必须充分发挥人在认识与知识中的逻辑在前的先天“立法”功能。“如果直观必须遵照对象的性状，那么，我就看不出人们怎样才能先天地对对象有所知晓；但如果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必须遵照我们的直观能力的性状，那么，我就可以清楚地想像这种可能性。但由于如果这些直观应当成为知识，我就不能停留在它们这里，而是必须把它们作为表象与某种作为对象的东西发生关系，并通过那些表象来规定这个对象，所以我要么可以假定，我用来做出这种规定的那些概念也遵照该对象，这样一来我就由于我能够先天地对它有所知晓的方式而重新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要么我假定，对象或者——这是一回事——对象惟一在其中（作为被给予的对象）被认识的经验遵照这些概念，这样我就马上看到一条更为简易的出路，因为经验自身就是知性所要求的一种认识

方式，知性的规则我必须早在对象被给予我之前、从而是先天地就在我里面作为前提，它在先天概念中得到表述，因而经验的所有对象都必然地遵照这些概念，而且必须与它们一致。”这一思维原则的转变，就是“哥白尼式的革命”。

这些哲学自身精神家园的深刻道理，只有深入解读重大哲学家的重要原典作品，才能真正领悟和体认。

四、贯通思想历史以发掘哲学思维的逻辑

对待哲学原典的文本回归和意义诠释，我们明确主张，论从史出，言之有据。但是也绝不限于就事论事，局限于原典本身，而应着力发现其历史逻辑联系。即用“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其匪强，来之无穷”^①的态度和方法，发掘原典的历史逻辑、思想逻辑和认识逻辑，从而在思想的不断建构和解构中，追问哲学思维的形而上学意义。

事实上，尽管不同时代的哲学家们往往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言说和叙事，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逻辑则把他们看似色彩迥异贯穿起来，从而呈现出一定的思维逻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哲学的形上意义就在于发现这一思维逻辑。

作为哲学门的学子，经过严谨的原典文本解读，发现思维逻辑的理论脉络，以批判理性的反思精神，检讨现实和理论的合理性，方能彰显其崇高的学科使命。

就西方哲学思想的历史逻辑而言，在外在他律性和内在自律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同时代的哲学原典，体现了其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逻辑沿革的主要经历了下述阶段：古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Ontology）思维、中世纪上帝一元论的神本思维、近代哲学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思维转向、现代西方哲学思维的语言学和生存论转向以及当代哲学的价值论思维诸阶段。

^① 盛唐诗人司空图语。

一是古代本体论向近代认识论思维的转化

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基本上都是自然哲学家，他们一开始就把思维的兴奋点集中在人以外的对象世界，并用宇宙构成论的分析思维方法，究根穷理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终极玄思的发问方式，探究宇宙万物的“始基”是什么，由此形成了自然理性的传统，奠定了古代形而上学的本体论（Ontology）思维的基础。

中世纪上帝一元论的神本思维。是欧洲中世纪的长夜，宗教哲学君临思想、科学和艺术的一切领域，由此形成了上帝一元论的神本思维。奥古斯丁坚定基督教哲学的立场主张，异教会不会有比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基督教提供更好的一种哲学呢？他坚定地认为，研究哲学就是为了获得幸福，而上帝向人指向幸福之路，因而，只有遵循基督救世主所指引和给出的道路，人才能获得幸福。奥古斯丁认为至福——Beatitude 是一切哲学活动的目标，基督教的信仰和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达到至福的惟一的、最好的道路。基督教的普爱（Universal love）精神甚至主爱仇敌。基督教哲学认为信仰先于理性，原因在于如果没有信仰，理性就无力达到自己的目标——幸福。中世纪上帝一元论的神本思维，崇尚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的三段式（Syllogism）。

近代西方哲学思维，实现了的认识论（Epistemology）转向。

自十六、十七世纪以降，欧洲人文主义、自然科学两场运动，轰轰烈烈地拉开了西方近代思维文化史的序幕。由此决定了西方近代生活世界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世界观的分化。

伽利略成为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精神的始作俑者，他用数学化、理想化的科学方法研究自然，主张“在这个世界中的对象不是单个地、不完全地、仿佛偶然地被我们获知的，而是通过一种理性的、连贯地统一的方法被我们认识的，随着对这种方法的不断运用，我们最终能彻底认识这里的一切对象的自在的本身。”^① 从而成为近代伟大发现家之颠的人物。胡塞尔

^① [德]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称伽利略“既是发现的（entdeckend）天才”，也是“掩盖的（Verdeckend）天才”；“他发现了数学的自然、方法的理念，他是无数物理学的发现和发现者的先驱。伽利略发现一直被称之为因果规律的东西，即‘真正的’（被理想化和数学化了的）世界的‘先天的形式’，‘精确的规律性的规律’，按照这种形式和规律，在‘自然’（被理想化了的自然）中所发现的一切事件都必定服从于精确的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既是发现又是掩盖，以致我们现在把它们当作不言自喻的真理。”^①

近代西方知识论的思维模式，在哲学上是以经验论的兴起为标志的。经验论哲学又以对自然界的观察证明为基础。哥白尼、开普勒对天体现象的观察说明，伽利略、牛顿对宏观物体运动过程的观察和说明，都为经验论哲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当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结果进行说明，古代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方法（工具）显得苍白无力时，弗兰西斯·培根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必须有一套新工具的思想。经过研究思考，培根于1620年出版了《新工具论》，试图在获得自然知识的方法上以此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他的所谓“新工具”，只是对于归纳方法的重新重视。他主张在获得自然知识的过程中，要重视观察、分类等方法。这是经验论哲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开端。并且，培根还提出了人们在获得自然知识，运用观察、分类的归纳方法时应该力戒四种最容易犯的错误。他说，人们有屈从于“幽灵”的四种类型的心理弱点和倾向。第一种是“种族的幽灵”，因为我们是人，所以在认识过程中，难免想入非非或痴心妄想，特别是期望在自然现象中有比实际更好的秩序。第二种是“洞穴的幽灵”，这是每个人的个别怪癖，是无其数的。第三种是“市场幽灵”，起因于心灵为言词所眩惑的倾向，是一种在哲学里尤为猖獗的错误。第四种是“剧院的幽灵”，是由各种思想体系与学派所产生的错误。

对西方经验主义思维传统影响最大的是托马斯·霍布斯。他一方面属于经验主义的传统弟子，十分欣赏数学方法，从而使他与伽利略、笛卡尔

^① [德]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转引自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页。

发生联系。另一方面，通过与笛卡尔等的接触，使他重新认识了演绎方法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从而对科学方法有了更正确的认识，这是培根所不能企及的。虽然霍布斯的最重要著作是政治性的《利维坦》，但是，这本著作中，霍布斯为经验主义哲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用严格的机械术语，对人和人的心理叙述，以及对语言和认识论问题都作了经验论的阐述，他像伽利略和笛卡尔一样，认为我们所经验的任何东西，都起因于外部物体的机械运动，而视觉、声音和气味等等都不在客体之内而是我们所私有的。由此决定了霍布斯在求知的方法论问题上主张经验与理性相联系的合理方案。

近代哲学思维的真正认识论转向，直接肇始于笛卡尔。

在知识论问题上，笛卡尔进一步思考求知方法问题，于1637年出版了《方法论》，作为他研究的自然哲学三卷著作的前言。1641年出版了《沉思录》，1644年又出版了《哲学原理》，全面阐述了他关于求知方法的思想。他提出了求知过程必须遵守而且他自己已经如此做了的四条原则：

首先，在认识过程的前奏阶段，除了清晰而独立的理念，再不接受其他任何先验的东西。其次，必须把思维中要解决的问题按需要分解成不同部分。第三，思维进程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程序，哪里没有顺序，我们就必须假设一个。最后，为了保证思维的全面性，而不忽略任何东西，我们必须随时经常地详细核查。由此可见，笛卡尔哲学强调思维方法是毋庸置疑的。他从经验主义出发，走向理性主义，在归纳和演绎之间寻觅合适的关系。从而在总体上影响着唯理论和经验论两大阵营的欧洲哲学的发展。至于其本体论上的二元论则是与认识论的怀疑论分不开的。正如没有思想就没有痛苦一样，笛卡尔的怀疑论正是在他对认识方法深入思考的痛苦中产生的，由此引导了欧洲认识论求知探索的思路走向深入。

倪梁康先生曾经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ego cogito ego sum）命题进行了形式解构，他认为，“由于拉丁语中的“cogito（思）和“sum”（在）既是动词原形，也在无需列出主语的情况下表达着第一人称单数的

形态，因而“ego”（我）的前设可以被有意无意地巧妙隐去。但严格说来，这里的完整内容应当是，“我思”（ego cogito）和“我在”（ego sum）。如果已经设定思维的主体是我，那么再从思维活动得出思维主体便是同语反复”^①因而“我思故我在”标识近代思维强调“我思”的确然性，因而“思想是存在之家”。据此，笛卡尔就实现了近代思维的认识论（Epistemology）转向，从而超越了古代哲学的本体论（Ontology）思维，开创近代以来主客两分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思维模式和理性主义（Rationalism）的方法论（Methodology）传统。文德尔班评价说，意识的存在确然性是笛卡尔通过分析方法所获得的统一的和基本的真理。

继笛卡尔之后的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维柯，直到大不列颠的经验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笛卡尔哲学对理性主义的复活和对经验的引导的结果。

二是康德哲学批判理性思维的精神丰碑

沿着笛卡尔“我思”的主体思维理路，康德进一步以批判理性的旗帜，把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思维发展到极致。乃至从近代启蒙运动到整个20世纪，在哲学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康德思想的足音。

以往在康德思想的理论渊源上，人们往往只重视了休谟和卢梭思想对他的影响，这自然是正确的，如休谟怀疑论的方法，特别是休谟关于归纳逻辑的非难，对于康德批判理性的方法检讨主体能力，在问题意识的启发上，是至关重要的。休谟的人性论思想方法，直接影响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认识论倾向，它不仅使康德超越了独断论的认识论，而且直接启迪了康德关于意识理性、道德理性和审美理性的价值多元思想方法（这得益于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两分法的思想）。罗尔斯认为，“康德非同

^① 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8页。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转引自倪梁康《自识与反思》，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页。